

Collection of
Hsiao K'ui's works

夏鼎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

A Collection of 考古学专刊 *Xia Nai's works*
甲种第二十六号

夏鼐文集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

中 册 目 录

第三编 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研究

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	3
《安阳殷墟头骨研究》序言	6
《殷周金文集成》前言	10
最近长沙出土吕不韦戈的铭文	16
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	17
有关安阳殷墟玉器的几个问题	34
所谓玉璿玕不会是天文仪器	41
汉代的玉器——汉代玉器中传统的延续和变化	50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棺槨制度	73
关于“金缕玉衣”的资料简介	80
汉简中关于食粮计量的“大”“少”二字释义	85
太初二年以前的玉门关位置考	87
新获之敦煌汉简	92
敦煌藏经洞封启的年代	114
漫谈敦煌千佛洞和考古学	116
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	119
西安唐墓中出土的几件三彩陶俑	149
长沙东郊杨家山南宋墓墓主考	154
《永乐大典》引《元河南志》古代洛阳图跋	156
《陇右金石录》补证	159
《辉县发掘报告》(节录)	171
《长沙发掘报告》(节录)	195
甘肃考古漫记	223
评陈万里编著《陶俑》	277
评《陕西省出土唐俑选集》	279

第四编 中国科技史的考古研究

考古学和科技史——最近我国有关科技史的考古新发现	283
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	299
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	305
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	338
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	361
汉唐丝绸和丝绸之路	366
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	377
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	391
另一件敦煌星图写本——《敦煌星图乙本》	420
《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读后记	432
湖北铜绿山古铜矿	434
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	448
我国出土的蚀花的肉红石髓珠	458
沈括和考古学	465
《梦溪笔谈》中的喻皓《木经》	481
元安西王府址和阿拉伯数码幻方	488
西洋种痘法初传中国补考	496
略谈番薯和薯蓣	500
评陕西省博物馆编《耀瓷图录》	503
评周仁等著《景德镇瓷器的研究》	504
评罗伯·提查尔著《中国青瓷的青釉》	507

第三编

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研究



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

会议就要结束了。正确地说，会上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要多。我想谈四个问题：

一 夯土城墙问题

在参观过程中，曾听到两种议论。一种说，城堡在哪里？另一种说，这下可解决问题了！这两种想法是两个极端。夯土城墙是一个问题，但夯土与城墙则是两个问题，因为夯土未必是城墙。这次来参观，是一个学习机会。河南同志的工作做得很好。参观中已经看到，王城岗遗址有夯层，有夯窝，这是工作中已经解决了的。基槽是城墙的基槽，这个问题不大。底部有的地方有些淤土，不厚，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夯筑过程中遇到下雨，就可能出现淤土。从基槽的深度，可以推知墙体的相对高度，这两者是有一定的大致比例的。不过，基槽上边的墙体一点没有保留，上面压盖的是一层相距不久的文化层，这是一个问题。

二 地层文化问题

关于地层，考古学上称为地层学，或叫层位学。这没有什么奥妙，不过说地层堆积的层位上下表示堆积时代的相对的迟早。

有城，城里一定有人活动。时间愈长，堆积愈厚，层位关系也愈复杂。地层是我们据以判定相对年代的依据，这在田野工作中是一种常用的方法。

王城岗城址下边是河南龙山文化中后期偏晚的遗存，也有人认为是晚期的开始阶段。上边为河南龙山晚期遗存打破，它的时代约当王湾三期。不过，王湾三期还有早晚之分，所以那层被基槽打破或压住的文化层是中期末还是晚期初，意义

^{*} 本文是1977年11月22日作者在国家文物局召开的登封王城岗遗址发掘现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原载《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

似乎不大。基槽也即城墙的年代，可以定为龙山文化晚期。这在发掘工作中可以说是解决了。

三 夏文化问题

首先应假定：（1）我们探讨的夏王朝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不像有些疑古派认为可能没有夏王朝。（2）这个夏文化有它一定的特点。发言的同志虽然没有说明这二点，看来大家想的是差不多的。

“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有人以为仰韶文化也是夏民族的文化。纵使能证明仰韶文化是夏王朝的祖先的文化，那只能算是“先夏文化”，不能算是“夏文化”。夏王朝时代的其他民族的文化，也不能称为“夏文化”。不仅内蒙、新疆等边区的夏王朝时代的少数民族的文化不能称为“夏文化”，如果商、周民族在夏王朝时代与夏民族不是一个民族，那只能称为“先商文化”、“先周文化”，而不能称为夏文化。

会上发表的意见，大致有以下四种：（1）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四期都是夏文化遗存；（2）河南龙山晚期与二里头一、二期遗存为夏文化遗存；（3）二里头一、二期遗存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至于夏代前期的文化是哪些则没有说；（4）二里头一至四期是夏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不是。

我认为现有的材料还不足以说明哪一个是夏文化，条件还不太够。四种意见都有说不通的地方。过一些时候，大家再进行讨论。

会上提到四个条件。地域与社会性质，看来问题不大。地域是同一地域；社会性质则夏、商都是奴隶社会。问题是文化与年代。要分析文化性质。另外是年代。这个问题很麻烦，因为商代的灭亡是在公元前1122年或1027年，这两种说法便相差百来年，还有其他说法。至于商代的总共年数是四百九十余年还是六百多年，不得确知。夏的年代更没法说清。或以为四百余年，或以为比殷代更长。目前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也还有些问题需要解决。一则是它本身的误差；再则是树轮校正年代的准确性。殷商的文化面貌，早晚都较清楚；夏文化的面貌则不清楚。汉代学者所描写的夏文化的面貌，有许多是根据三统说加以引伸而推上去的。夏商文化有共同之处，也有差异之处。有同志说郑州是汤都，二里岗下层便是商朝最早的文化，可郑州还有早于二里岗的商文化遗存。有共同点，又有差别，这里很复杂。可以继续研究。

四 夏都问题

一般的探索过程，是先确定一个遗址属于某一王朝，然后再确定它是该王朝的京都。如果夏到不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那么告成镇王城岗的城墙为夏都城之说便难以成立了。所以，这里首先要解决的是夏文化问题。如果这遗址属于夏文化，也仍有这是否是都城的问题。如果某一遗址由各方面的强有力的证据可以确定是夏都，那也可以由此找到一个标准，根据它去搞清楚夏文化的面貌。

但是，关于禹都阳城说的时代还是比较晚。孟子上距夏禹将近两千年了。而且还有禹都安邑等说法。纵使禹都阳城，是否即战国时阳城，也可能是另一个地点，虽然很可能是指战国时代的阳城的附近地带。

这个王城岗遗址有城，但是不是京都？城有两种：一是城堡，一是城市。后者是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也不一定只有一个城圈。北京旧城，内外就有两个城。但是城堡本身并不便是城市。农村中的土围子不是城市。北京紫禁城也是城堡性质，本身并不是城市。古代的城市常有城墙，但是城市不一定非有城墙不可。

另外，这次发现的东周阳城则没有问题。它的发现为寻找禹都提供旁证和线索。这个城有城墙，城墙的年代可定为战国初。城内有宫殿遗迹、陶片，是战国和汉代的。陶片和瓦片上还有“阳城”字样。这个发现也很重要。

最后，提几点建议：

第一，希望同志们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虽然这次会上没有能够作出结论，但可以肯定，离做结论的日期是一天比一天近了。

第二，建议大家来注意这个问题，加强合作。到会的有邻近各省的同志，大家一起合作，更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第三，希望以后能再开这样的会，贯彻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争鸣中，共同提高考古学的水平。

《安阳殷墟头骨研究》序言^{*}

体质人类学 (Physical Anthropology)^①, 包括它的分支人类测量学 (Anthropometry), 是近代才产生的一门冷僻的学科, 而专门从事于死人骨骼的研究, 则更是冷门中的冷门。但是, 这种研究却需要有踏实的基本训练。除了要掌握一些操纵测量仪器的技术之外, 这些训练还要包括人体解剖学、病理学和统计学等。尤其是解剖学更是从事体质人类学者所不可缺少的专门知识。在研究工作的过程中, 既需要有不厌其烦的耐性, 又需要有力求精确的谨严学风。所以, 这门学科是不会成为热门的。

体质人类学在我国现下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实际上, 它不仅在科学研究中有相当的地位, 并且也具有实用的价值。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有一个时期在我国的市场, 许多顾客买不到适合尺码的鞋子, 而另几种尺码的鞋子却积压在货架上卖不出去, 以致许多人以无术“削足适履”而兴叹。如果生产部门能利用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 便会避免或减轻这类的困难了。至于死人骨骼 (包括人类化石) 的研究工作, 虽然它的实用价值不大, 但是作为一种科学研究, 仍是很重要的。这种研究可以阐明人类的起源和演化, 确定不同时期的各地居民的种族, 他们的营养情况和疾病。我们也可以由墓中死者的性别和年龄以推测当时氏族、家族等社会组织。这些不只是体质人类学的问题, 也是考古学上的问题。

体质人类学这一门学科的创立, 一般归功于德国的 J.F. 布卢门巴哈 (Blumenbach, 1752~1840)。他特别致力于头盖骨的形态的研究, 曾经根据头骨测量的研究结果, 将全世界人类分为五大种。另一位奠基人是法国的 P.P. 白洛加 (Broca, 1824~1880)。他曾创制人体测量仪器多种, 并于 1859 年在巴黎创立〔体质〕人类学会。他们二人还都是著名的解剖学家。

这门学科引进我国是在本世纪的 20 年代。我们回忆抗战以前的情况: 当时北京协和医院有 P.H. 史蒂芬逊 (Stevenson, 1890~?) 和步达生 (D.Black, 1884~

^{*} 《安阳殷墟头骨研究》一书,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共同编著, 文物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① 这一学科, 在英语国家叫做“体质人类学”, 在欧洲大陆各国叫做“人类学”。前者在我国比较通行, 所以这里便采用了它。

1934), 成都华西大学有 W.R. 莫尔斯 (Morse, 1874~?), 他们都是解剖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有李济 (1896~1980) 和吴定良 (1901~1969), 清华大学有史禄国 (S.M. Shirokogorov, 1887~1939)。这些前辈学者将体质人类学引进中国, 其中李、吴二位还是我们中国的学者。李济是美国哈佛大学 R.B. 狄克松 (Dixon, 1875~1934) 和 E.A. 荷顿 (Hooton, 1887~1954) 二教授训练出来的学生, 但是回国后改行专搞中国考古学了, 虽然他始终未能忘情于体质人类学。吴定良从教育统计学转攻人类测量学, 曾在伦敦大学 K. 皮尔逊 (Pearson, 1857~1936) 的实验室中做过几年研究工作。皮尔逊是生物测量学一派的大师, 这一派强调利用数学方法来处理人类测量数据, 是体质人类学的一个旁门。吴定良返国后便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四组 (人类学组), 后来筹备过体质人类学研究所, 又分别主持过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人类学系与人类学专业。解放以后以研究人类化石闻名的吴汝康和本书的主编兼作者杨希枚都曾在他的人类学组工作过。至于李济在南开大学时的学生陶云逵, 曾赴德国深造, 可惜返国后不久在抗战中期便去世了。颜闾 (1908~1970) 曾从莫尔斯和史蒂芬逊学习。1984 年左右曾赴美国进修。费孝通曾从史禄国读过体质人类学, 但后来专攻社会人类学了。这是抗战以前我国体质人类学的大概情况。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内, 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工作虽然没有中断, 但进入低潮。一直到解放以后, 才又迈步向前发展。

有了我国体质人类学发展情况作为背景, 现在再来谈谈殷墟头骨的研究。解放以前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考古学家如李济和梁思永, 都曾在外国学过体质人类学。虽然梁思永是以考古学为主科, 而李济返国后不久也改而专攻考古学, 但是他们都很重视出土人骨的研究工作。我在 1935 年参加殷墟发掘时, 还听说过一个关于董作宾 1928 年主持初次发掘时“挖到和尚坟”的故事。书斋中出来的董作宾, 从来没有看见过出土的骷髅头, 只从笔记小说中知道死人身上头发是最不易腐朽的。所以, 他发掘到一座时代不明的古墓时, 便认为头上无发的墓主人一定是一位和尚。骷髅头狰狞可怕, 所以仍被埋起来。到了李济、梁思永主持发掘时才注意到人骨标本的采集, 并且用科学的采集方法和保存方法。

1935 年春, 我到殷墟发掘团参加工作时, 采集人骨标本已成为一种制度。所有出土的头骨 (头盖骨和下颌骨)、盆骨、肢骨和肩带骨 (锁骨和肩胛骨), 如果保存良好, 都要加以采集。每件在小心提取、洗刷干净和编写标本号以后, 便用浸湿的麻纸糊上几层。我们住在侯家庄农民家中。每星期天返城内冠带巷工作站休息时, 便运回一批到城里。洗刷和糊纸的工作, 有时便在城内进行。整理后便放在走廊上以便阴干。记得有一次, 梁思永发现一个带下颌骨的头骨的齿部外边所糊的麻纸被撕破, 还脱落了门齿。他质问工人, 据说是前几天留宿在工作站的一位洋鬼子干的。他听后只好叹口气不再追问下去。我们蒙古人种的一个特征是门齿多作铲形。现代中国人是这样, 殷代人也是这样。这位洋人大概拿去几枚殷

人门齿作为珍贵的科学标本。李济曾说过，考古学家一定要有体质人类学的常识。但是要想成为真正合格的体质人类学家，最好能先取得 M.D.（医学博士）学位。这或许是他后来放弃体质人类学工作而愿意将殷墟人骨材料让给别人研究的缘故。

抗战以前在历次殷墟发掘中所采集的人骨标本，仅就头骨而言，其数近千。后来都集中在南京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吴定良由英国返国后，这些人骨标本在战争情况下几度搬迁，由南京而云南昆明，而四川南溪李庄，复员时搬回南京，最后运往台湾。这样多次的搬迁，使这些标本遭受到很大的损失。据说在台湾最后整理时，头骨完整可供测量者仅余 398 个。这是由于当年贪图省事，许多头骨脑腔内的填土没有挖取出来，以致干燥后成为坚硬的小泥球。搬运时受震动，这些泥球碰击头盖骨，有时便把它打成碎片。此外，在搬运的过程中，还发生过一次大误会。1941 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避居四川南溪李庄时，由山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所在地的月亮田搬运人骨标本箱子到山上板栗坳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有一个箱子被碰裂开，露出了满箱人头骨。这里的乡下人本来对于外来的下江人很不信任，加以前几天有几位广东籍的同事捕捉一条蛇宰杀了作成佳肴打牙祭。所以，一下子谣言便传开了：这些下江人嘴馋得很，什么东西都要吃，蛇不用说，连人也要吃。满箱的人骨便是铁证。肯定人骨还不止这一箱呢！闹得满城风雨。最后还是由历史语言研究所负责人开了一次群众会，向大家解释一通，这事才平静下去。

吴定良在没有把这批标本交还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前，曾把头骨逐个做了几种测量，作成记录。他自己始终没有把这批头骨测量数据整理出来。但是李济在台湾曾利用吴定良留在所中的记录副本，把这批数据全部发表了，并写了引言介绍这批材料，还指出商代人头骨的某些测量特征。后来他又请杨希枚对这批头骨作深入的研究。杨希枚花了几年的工夫，对这 398 个头骨作了大量的测量，并加以分析，又作了形态学的观察，写出了他的研究成果。尽管他的结论中某些方面可能还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的研究成果对于今后殷墟头骨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迄今为止数量最大的可靠的数据、谨严深湛的分析和富于启发性的推论。他由台湾回返北京以后，又和北京的同行们交换意见，互相讨论，加强我国从事这项工作者的团结，是另有其重大意义的。

解放以后，安阳殷墟继续发掘，收获丰富。人骨标本也累积了不少。颜闾进考古研究所工作后，所中便把这批材料连同各地新石器时代人骨标本交给他整理研究。他生前把精力主要放在新石器时代人骨研究方面。对于殷墟人骨，他曾和毛燮均合作写出一篇关于人牙的研究报告。他去世后，吴定良主持的复旦大学人类学专业毕业的韩康信和颜闾的多年助手、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潘其凤二位承继颜闾的工作，对于解放后出土的殷墟人骨做了大量的研究，已写出几篇论文。

在台湾省，继杨希枚之后，他的学生林纯玉、许泽民等，对于存放在台湾省的殷墟人骨的脑容量和颅顶间骨，臧振华对于殷人门齿，也都作了研究，发表了

论文。台湾海峡两岸的学者都注意殷墟人骨的研究，是今后这一研究工作一定能够继续发展的征兆。

这一本《安阳殷墟头骨研究》论文集的编集，是杨希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报到后谈到工作计划时才决定的。历史研究所尹达所长和我一样，都是30年代初期参加殷墟发掘的旧人。他和我一样，都曾亲自在墓坑中剥人骨架，提取，洗刷，写标本号；甚至于糊麻纸的工作，也都曾做过。对于这批材料的整理和发表，他是非常关切的。于是，我们商得院领导和有关各方面的同意，决定请杨希枚主编这本论文集，由韩康信和潘其风二位协助。现在全书已经编就付排。我很高兴这书能够出版，所以不嫌外行，写几句话当做序言。因为是外行人，所以这里所说的完全是些外行话，也是题外语。但是，其中关于背景材料的介绍，可能对于读者们并不是完全没有用处吧！

1983年6月19日

《殷周金文集成》前言*

这部《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简称《集成》),经过我所的《集成》编辑组的同志们多年来辛勤的劳动,现在资料搜集行将完成,编纂工作大体就绪,第一册已经可以交付出版了。今后,其他各册也将陆续付印。这部书的出版,将为殷周青铜器的研究,尤其是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提供极大的方便,因之,我们相信,这将会促进这方面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30多年前,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初成立时,在郭沫若院长的领导下,郑振铎所长和梁思永副所长亲自抓考古研究所的发展方针和远景规划的制订工作。当时的设想是:考古研究所的主要任务应该放在创新方面,便是说,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提高田野考古工作的质量,以便取得翔实可靠的实物资料,然后利用这些新取得的资料,结合过去累积的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但是同时也认为:对于我国有悠久历史的金石学,尤其是其中的优良传统,也应该加以吸取和发展,使之成为系统化的古器物学,而后者可以作为现代中国考古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般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的金石学,在北宋时代便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以图像和拓本(包括摹本)来表现古器物 and 古文字的金石图谱,在当时便出现了。但是,当时金石学的内容,如果依照现代的学科分类来说,实际上包括有铭刻学(Epigraphy)和考古学(Archaeology)两门学科。北宋金石学家吕大临在《考古图》的序文中说:“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他把古器物的形制和铭刻的文词二者区分得很清楚。

现代的考古学是利用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实物(不限于古器物,还包括人类居住及其他活动的遗迹,以及反映人类活动的自然物,如农作物、家畜及狩猎品的遗骸),进行历史研究的一门科学。它和利用文字记载进行历史研究的狭义历史学,都是历史科学(广义的历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是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标。二者对于历史科学的研究,犹如车子的两轮,不可偏废。不过,

*《殷周金文集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的大型铭刻资料集录。全书收录宋代以来各家著录、国内外主要博物馆收藏和解放后各地出土的殷周铜器铭文近12000件,按器类和字数编次,共计18个分册,由中华书局用珂罗版原大精印于1984~1990年陆续出版。

考古学的对象一般都是属于一定时间以前的古代，所以近代史和现代史不属于考古学的范围。历史越古老，文字记载越稀少，考古学研究也就越重要。到了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史前史的研究便几乎完全依赖考古学了。因之，史前史也便等于史前考古学。

铭刻学是对古代刻在金、石、甲骨、泥版等坚固耐久的实物上的铭文进行各方面研究。这些研究包括认识文字、读通文句、抽绎文例、考证铭文内容（例如考证纪年、族名、邦国、人名、地名、官制、礼制和史事等），以及根据字形、文例、考证的研究结果，来断定各篇铭文的年代和它们的史料价值。它是以铭文作研究的主要对象，所以除了把其中的古文字经过考释改写为今日的楷书以外，它的考证方法，和利用传世的一般古代文献记载一样，完全是属于狭义的历史学范围。但是它又是以古代遗留下来的金、石等实物上的铭文为研究对象，而这些实物又经常是要通过考古发掘才重新被发现出来的，所以它从前常被隶属于考古学这门科学下作为一个分支。事实上，它现在已经由附庸蔚为大国，常被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了。埃及、希腊、罗马等地方古代纸草写本（papyrus）的研究，已独立成为一门“纸草写本学”（Papyrology）。就写本内容而言，可以算是铭刻学的一部分，但它所用的书写材料是纸草，并且是书写、不是镌刻，所以一般的铭刻图录中不收纸草写本。关于我国汉晋简牍的研究，日本学者称它为“木简学”。它也是同样的情况，既可以算铭刻学的一部分，又可以独立自成为一门分科。

至于古文字学，又是另一门学科，是语文学的一个分支。我们通常所称的“中国古文字学”，实际上是汉字的古文字学。它包括西文中所谓古字体学（Paleography，研究古字的形体以确定古写本的年代和地区）、语源学（Etymology，探讨每字的原始意义）等。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所以汉字古文字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汉族古代文字的形体、声音和字义（诂训）。它的内容既包括铭刻学的资料，也包括像许慎《说文解字》之类的并非铭刻的辗转抄下来的书本上的有关资料。铭刻学家一定要懂得他所研究的那一部分铭刻上的古文字。反过来说，古文字学家也一定要懂得怎样去利用铭刻学中与他的研究有关的资料。二者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有许多学者同时既是铭刻学家，又是古文字学家。但是这两门学科的着重点是有所不同的。清代朴学鼎盛时，古文字学家推崇《说文》，认为许（慎）学为小学（古文字学）的“不祧之祖”。有人讥笑当时的铭刻学中的金石文字研究为“善辨模糊字，搏攻穿凿文”。近代我国古文字学家如章太炎、黄侃师生二人，对于甲骨、钟鼎的铭刻，都是抱有偏见的。章太炎最初完全否认甲骨文，直到去世前，仍以为“甲骨之为物，真伪尚不可知”；至于金文，他晚年仍认为“钟鼎可信为古器者，什有六七，其释文则未有可信者”，以为是“穿凿之徒，皮傅彝器，随情定字”（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1979年版，第934、954~956、957页）。黄侃晚年曾说过：“〔钟鼎、甲骨〕虽其文字不容致疑，惜其解说犹有可

疑处。故学者莫如先玩其拓文，而不必急读其解说可也”（《文字声韵训诂笔记》，1983年版，第19页）。我们平心而论，现今我国许多学者对于铭刻中古文字的解说，其中虽也有可疑的，但有更多的地方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不读其解说，怎能知道这些解说可疑与否？如果我们参考前人的解说而不盲目轻信，岂不是更容易地使用自己的判断力来解决铭文的认识问题吗？黄侃的话，可能是对着像他自己那样精通古文字学的学者而说。一个铭刻学者是不会说这样的话。一个毫无偏见的古文字学者也不会这样说的。这里也许可以看出古文字学和铭刻学这两门学科的着重点的不同处。王国维说的话比较公允。他说：“自来释古器者，欲求无一字之不识，无一义之不通，而穿凿附会之说以生。穿凿附会者，非也。谓其字之不可识，义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毛公鼎考释·序》）现下仍有个别搞铭刻学的人，过分强调铭文的解读，有时完全不顾古文字学的原则或通例，将一些不易考释的铭文中每字都加考释，每句都加解说，实际上不过是“穿凿附会”而已。这在现下的铭刻学界当然只是个别的现象。古文字学家中有些人也不免有这种偏差。

我们将考古学（包括它的组成部分的古器物学）和铭刻学的涵义搞清楚后，便可以进一步来讨论像《集成》这一类书籍的性质和它的重要性。我国北宋以来编纂得比较完善的金石图录的内容，常是包括有古器物的图像和铭文的拓本（包括摹本），并附以文字的说明。但是，有的图录扩大了收录的范围，所收入的图像包括大量的没有铭文的古器物，后来甚至于有的全书都是没有铭文的古器物。这些没有铭文的古器物，常常不是金属或石制的，例如泥俑之类的明器。这样，它们便成为古器物学的图录。近代古器物学家罗振玉曾指出：“古器物能包括金石学，金石学固不能包括古器物也。”（《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收入《永丰乡人甲稿》中）实则，古器物学也只能包括金、石等质料的古器物的形制和花纹的研究。至于古器物上铭刻的考释和研究，那是属于铭刻学，而不属于古器物学。另一方面，有些金石图录偏重为铭刻学提供资料，仅有铭文的拓本（包括摹本），不附图形。罗振玉曾经叹息说：“〔金石学〕后世变为彝器款识之学，其器限于古吉金，其学则专力于古文字，其造诣精于前人而范围则转隘”（同上）。实则这种学科发展后引起的分化，乃是自然的趋势。有些学科只有把范围加以缩小后，研究才可更为深入。我们只能因势利导，使之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学科的发展是这样，图录编纂的发展也是这样。

在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开始后不久（16世纪），欧洲学者便特别注意古典时代（即希腊、罗马时代）的遗迹和遗物，因为他们是想把文学和艺术复兴到古典时代那样的高峰。18世纪时这风气更盛。他们把旅行到希腊、罗马的古代都市去凭吊古迹作为治学修养的一部分。“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情”。他们凭吊之余把这些古迹描绘下来，返国后便有人把这些描绘下来的图景，连同临摹下来的

铭文，一起加以制版印行。18世纪末拿破仑远征埃及时，顺便带了一队学者到埃及去进行实地的史地考察。后来，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学者于19世纪前半叶，也组织几次古物调查团到埃及去。他们都描绘古迹，临摹铭刻，返国后把古建图景和铭刻摹本印出来。这样便推进了埃及学这一门学科的发展。

被视为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德国学者 J.J. 文刻尔曼 (Winckelmann, 1717~1768) 研究罗马美术史，所利用的资料不限于古文献，而是大量利用传世的或新近发掘出来的美术品实物，以作系统的深入研究。考古发掘工作开始于18世纪对于赫伊雷尼和庞培的发掘，到了19世纪，逐渐成为考古学的主要方法之一，锄头打开了地下的历史资料的宝藏。同时，新发现的希腊罗马的铭刻也层出不穷。德国学者 A. 鲍刻 (Böckh) 编纂出版了《希腊铭刻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Graecarum) 四大册 (1828~1859 年出版)。著名的罗马史大师 Th·蒙森 (Mommson) 也主编了 16 卷本的《拉丁铭刻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 (1862)。此外，又有《伊朗铭刻集成》(1955 年开始刊行)，《印度铭刻集成》(1970 年开始刊行) 等等。由于考古发掘工作中几乎每年都有新发现的铭刻，所以这一类的集成都是未经编完，便已需要准备编纂补编。每隔一段时间以后，便要出版补编。有些考古发掘工地出土有新铭刻，这些铭刻资料整理后，或者作为正式发掘报告的一部分，或者独立成书，另册单行出版。至于希腊文和拉丁文铭刻学，每年都出有年鉴，发表每年新发现的铭刻。

和西方的铭刻学相比较，我国的铭刻学有自己的特点：(一) 甲骨刻辞是我国所特有的。(二) 先秦铭刻以金文为主，数量很多，而且有的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石刻铭文，则先秦时的极为罕见。(三) 我国汉文始终使用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不用字母拼音，所以铭刻中的古文字数量众多，字体繁复而多变化。(四) 汉代以来的铭刻，除印玺和碑额外，一般使用隶楷和正楷，和今日所通用的楷书并没有多大的差别，一般仍都可以认识，只是有些异体字而已。秦代的和先秦的铭文的解读，则需要有古文字学的知识。(五) 甲骨和殷周铜器，由于近代古董商人的作假，其中有不少伪刻的铭文，甚至于器物本身也是赝品，这需要先作“去伪”的工作。解放以后出土的大量有铭文的铜器，它们的可靠性是不容致疑的，可以省掉“去伪”的工作。(六) 我国至迟在唐代已有墨拓铭文的技术，这比临摹要正确得多。清末引进照相术和照片制版术，器物 and 拓本的印刷更为逼真了。根据上述的特点，我国金石图录便形成一套惯例，以适应这些特点。

考古研究所开始筹备编纂古代铭刻集成时，便想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使令体例更为完善，资料更为齐备。最初曾聘请徐森玉老前辈兼任《历代石刻图录》的主编，并为他配备了两位专职的助手。后来又调来甲骨金文专家陈梦家，请他于研究工作之外，替所里筹划《甲骨文集成》和《殷周金文集成》的编纂计划，并曾开始进行拓本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后来，《历代石刻图录》的工作，由于